昂山素季
離“總統”還有多遠?

11月9日下午3點34分，仰光市晴朗的藍天突降大雨。52歲的緬甸司機吳周彭（音譯），安靜地開著車，豎著耳朵聽收音機直播的開票新聞。“對于選舉，大家是有默契的。”他喃喃自語，也沒有及時回答記者的提問。

車窗外一片沸騰，大金塔邊的緬甸全國民主聯盟總部外早已人滿爲患。人群外圍有一排志願者手牽手，連成人牆，維護現場秩序。他們都是民盟的支持者，穿著統一的紅衣、手拿紅旗、頭戴紅巾、臉貼紅色圖紙，分別站在馬路兩邊，仰頭注視著露天電子大屏幕。

屏幕上，聯邦票選委員會在直播首都內比都的開票信息。選舉委員會主席一連宣布了民盟候選人獲得15個鎮多數票的消息，引起現場15次劇烈的歡呼聲。而當主席宣布第16個鎮的得票人是鞏發黨時，現場噓聲一片。

“這和我25年前看到的大選場景是一模一樣的，同樣的顏色，同樣的神情。”一名在現場的法國遊客感慨道。

25年通往自由之路

確實在這裏，25年前站著同樣一群熱血沸騰的人，他們也在等待選舉結果。但是，那一次選舉，他們等到的卻是“鎮壓”“禁言”。1990年5月，昂山素季帶領的緬甸民主聯盟占了先機。但是，選舉正式結果還未公布，緬甸軍政府就宣布“民盟”爲非法組織，同時以制造騷亂罪逮捕民盟領袖昂山素季。在後來的20年間，昂山素季被禁足，而“昂山素季”“民盟”也成了禁忌話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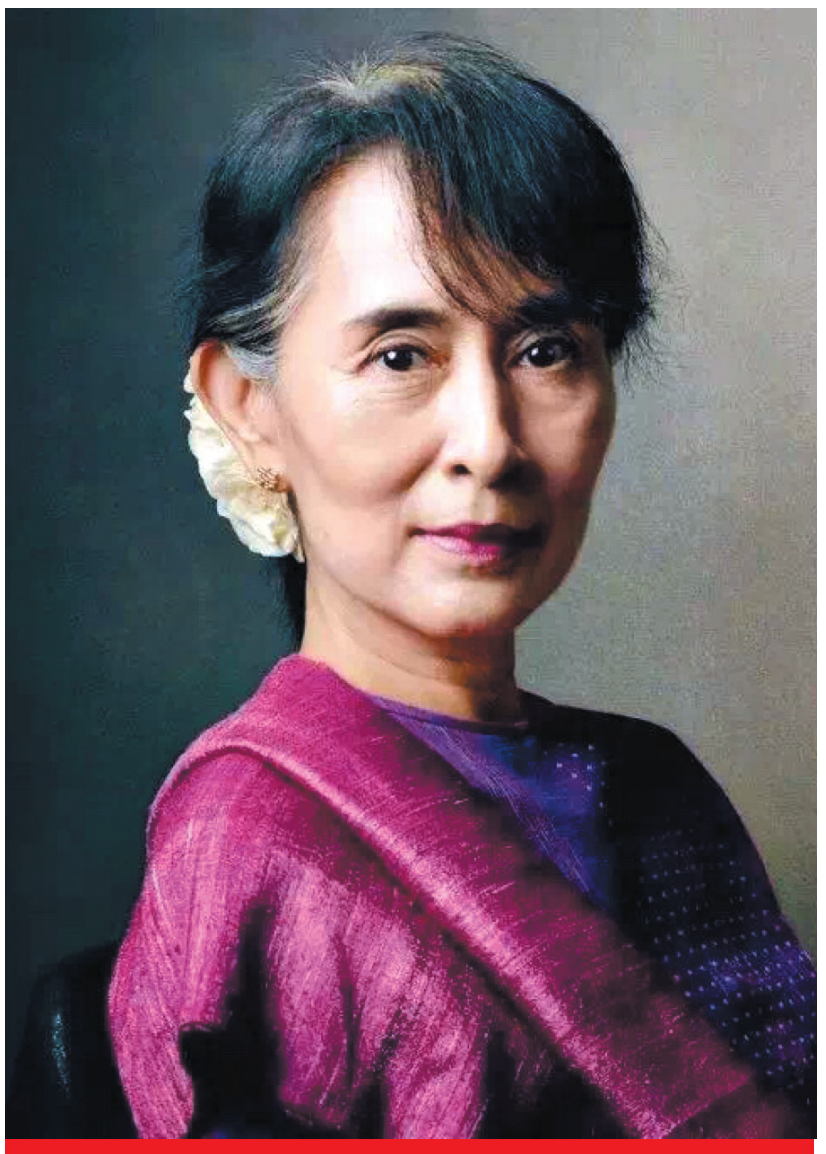
不過，今天的緬甸人都已經學會坦然面對這段黑暗的曆史，民衆開始在公開場合交流自己的想法，小商販會拿著報紙讀政治。當外國遊客提起“昂山素季”，她的支持者紛紛豎起大拇指。

“真的非常神奇，兩年前，緬甸人絕不輕易開口在公共場合談論政治。但是現在，大街上，你可以隨時聽見他們討論政治的聲音。”一位美國自由攝影師接受記者采訪時感歎道。

總統寶座花落誰家?

就11月10日公布的選舉數據來說，民盟的壓倒性勝利已經不容置疑——目前已公布的114個聯邦議會席位中，民盟占據107個席位，而現執政黨鞏發黨僅獲得7個席位。

不過鞏發黨的支持者也顯得異常冷靜。“我對民盟沒有太多的感覺，投票只是個人的選擇而已，大家都希望緬甸變得更好。”一位32歲的軍人後裔告訴記者。“其實，我對現任的總統還是比較滿意的，因爲他確實給緬甸帶來了不少改變，”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緬甸人向記者透露，“但我並不信任總統的手下黨派，相較之下，我更希望昂山素季成爲國家領導。”



緬甸現行憲法規定，凡是嫁娶外國人或家庭成員子女有外國籍都無權競選總統。理論上來說，民盟即使贏取選舉的勝利，昂山素季也無法當選總統。昂山素季曾不止一次發表過不滿，“世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會遇到這樣的窘境。”此外，11月4日的民盟新聞發布會上，昂山素季還喊出豪言：“我將超越總統。”

“媽媽”的總統之路

我們知道，在緬甸，昂山素季的粉絲都親切地稱她爲“媽媽”。但是很可惜，“媽媽”的總統之路充滿了坎坷，而這中間最大的阻礙就是憲法。緬甸現行憲法規定，凡是嫁娶外國人或家庭成員子女有外國籍都無權競選總統。昂山素季和已故丈夫、英國人邁克·阿裏斯育有兩子，因此理論上來說，民盟即使贏取選舉的勝利，昂山素季也無法當選總統。

對此，昂山素季曾不止一次發表過不滿，“世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會遇到這樣的窘境。”此外，11月4日的民盟新聞發布會上，昂山素季還拋出豪言：“我將超越總統。”

那麼緬甸“媽媽”究竟能否“超越總理”?或是垂簾聽政?這不僅僅是修改憲法的問題，更是時間的問題。只有新政府上台後修改選舉法，昂山素季才可能成爲“合法”的總統。

“這僅僅是開始，若民盟最後在大選勝出，新舊政府的交接工作起碼要5個月的時間，其間一切都會發生。”一位長期關注緬甸問題的德國記者Mandnfred P. Rist保守地評論道。

而緬甸現任總統吳登盛也在做低調的反擊。就在昂山素季大談執政權的問題時，他在Facebook上發了一段視頻。這段長達4分鍾的視頻中插播了阿拉伯之春後的暴亂畫面，片尾出現“只有和平的盛行才能帶來民主的實現”的字眼。很顯然，吳登盛是在諷刺昂山素季的“野心”。

昂山素季形容自己“高于總統”。“所有的決定都由我做出，因爲我是獲勝黨的領袖。任命一個總統只是爲了滿足憲法要求。”

“我們會設立一個政府，它會恰當運行，總統的行事範圍將有明確的規定。”

實際操作中，情況也許的確如此：在緬甸，所有人都知道昂山素季是全國民主聯盟（民盟）的領袖，而她之所以無法出任總統，唯一的原因就是她的子女持有外國護照，而緬甸憲法中有一條不起眼的規定，禁止存在這種情況的人出任總統。但她的語氣還是有些令人感到不適，甚至略顯專制。

事實上，那位亞洲新聞台的記者就跟她擺明了這一點，暗示這聽起來會像高壓統治。“我們不可能成爲獨裁政府，”昂山素季回答說。“我們之所以堅持了這麼久，是因爲我們有人民的支持，而依賴人民支持的政府永遠不會成爲專制政府。”

時間會證明一切。令人鼓舞的是，昂山素季已經致信緬甸總統登盛，以及軍方總司令敏昂萊、人民院議長吳瑞曼等要人，要求進行全國和解會談。如果昂山素季最終像所有人一直以來所期盼的那樣，成爲緬甸的領導者（即便是作爲傀儡總統背後的實際掌權者），這種與軍隊以及緬甸各地不同民族展開對話的意願，將是至關重要的。

當然，昂山素季一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頭面人物，她改變了這個國家的曆史。還有她在幾十年的軟禁期內所表現出來的堅忍勇敢，這些都從未受到過懷疑。

從年初的“《查理周刊》事件”到今天的巴黎恐怖之夜，不到一年的時間，法國接連成爲恐怖主義的襲擊目標。每一次恐怖襲擊發生後，都有人將之比作“9·11事件”。不同的是，美國在“9·11事件”發生後就果斷出兵阿富汗，摧毀了塔利班政權，並堅持不懈十余年，追殺了本拉登。而歐洲卻只能在一次次的展示團結和眼淚。

早在2005年，德國作家亨裏克·布羅德就曾說：“歐洲，你的名字叫綏靖。”面對一次又一次來自外部的恐怖襲擊，歐洲的反擊爲什麽總是綿軟無力?

恐怖主義面前 歐洲爲什麽任人宰割

●“多元化”是歐洲的政治正確，問題再多也沒人敢觸碰

根據前英國工黨勞工大臣、歐盟委員會主席羅伊·詹金斯在20世紀60年代所下的定義，“多元文化社會”是指相互包容的環境中的文化多樣性，官方對公民的宗教身份認同等不加關心，並且相信不同宗教背景的人在同一個政府之下能夠和睦相處。

在歐洲人看來，宗教信仰是個體或私人行爲，因而應當允許各團體信奉自己的宗教，但這些宗教信仰應與公衆和政治生活毫不相幹。這是“多元文化社會”賴以存在的基石。然而這樣的努力卻失敗了，因爲在一些族群看來，“政”與“教”之間區分是荒謬和難以理解的。

一些族群也越來越善于利用西方的民主政治手段來達到強化自己獨特的宗教民族認同的目的。他們越來越多地要求在歐洲社會中保留自己的文化傳統，甚至還要求從歐洲國家政府得到特別的資助。

在歐洲許多國家，穆斯林與主流社會隔離開來。年輕一代則通過家庭（傳統習俗）安排，與共同宗教和種族背景、特別是祖國來的人結成配偶。這樣一來，他們便在新的祖國建立了一個個事實上的“獨立社區”。在這樣一個“多元文化社會”中，人們不再共享文化、宗教、甚至國籍和語言，各自獨立的社區越來越突出了族群文化的符號特征。

現在的歐洲正處于一個難題之中，“多元化”的政策可以說已經失敗，但作爲一項政治正確，卻又鮮有批評的聲音。

直到2010年，德國總理默克爾在一次發言中表示：“不說德語，就不能融入德國社會。”默克爾是第一個站出來發表這種觀點的政治家，她的言論立刻贏得了歐盟另外兩大國領導人——英國首相卡梅倫和當時的法國總統薩科齊的強烈附和。但總的來說，歐洲社會輿論對這類問題的回應並不熱烈。

在過去的幾十年時間裏，歐洲是最忠于理想主義的大陸。“大熔爐”一詞就起源于法國，最初被法國人用來形容本國人口結構多元，這也是在過去一些年令法國人洋洋得意的事情。而在二戰之後，西歐的政治光譜曆來比美國偏左的多。

●綏靖是今天歐洲的普遍心態

有什麼詞比綏靖更能體現歐洲當前的普遍心態。這種綏靖就像是二戰之前，希望能夠通過對納粹德國的妥協，來維持相對安定的生活。

在曆史上，歐洲是一個威脅不斷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各國必須通過保持實力來維持和平。然而，二戰之後這70年，美國充當了“守夜人”的角色，歐洲依賴美國來維持和平。要知道，無論是從拿破侖戰爭結束到普法戰爭爆發，或者是從普法戰爭結束到一戰爆發，還有一戰結束到二戰爆發，都遠遠不到70年。

在北約28個成員國中，只有6個國家國防開支占到GDP的2%——這是北約的指導水平，更多的歐洲國家把錢省下來，投入到美好的生活中去。面對恐怖襲擊，歐洲人選擇最多的就是妥協，就像是西班牙在2004年遭遇恐怖襲擊後宣布從伊拉克撤軍。

●反恐措施非常鬆弛落後

盡管是最容易遭到恐怖襲擊的地區，但是歐洲很多國家對于恐怖主義的防控，遠遠不夠上心。

以“《查理周刊》事件”爲例，在襲擊發生前，恐怖襲擊者庫阿希兄弟早已被美國和法國情報部門列入了涉恐“黑名單”多年，只是如此具有恐怖襲擊傾向的兩人，並未曾引起法國安全部門的重視。

而在今年夏天，成千上萬的難民湧入歐洲，有人擔心這將給歐洲的安全帶來威脅。BBC記者專門去保加利亞進行調查，采訪了一個剛剛從保加利亞秘密情報部門離職的工作人員，這個工作人員說：“在保加利亞有個外國人，我們很懷疑。他是歐洲人，可以自由往來。我們決定跟蹤監視。但是，過了整整一個月，才拿到他祖國秘密情報部門提供的我們所需要的信息。你能想象嗎?不是幾個小時，而是幾個星期!”

效率如此之低，有人認爲這與歐洲人對隱私權的重視有關系。歐洲議會議員克勞德·莫拉說：“歐洲人普遍認同一點，即在隱私權問題上，他們與美國人存在分歧：如果美國人視言論自由爲不可剝奪的權利，有時可以淩駕于隱私權之上，那麼在歐洲，隱私權是一項最基本的權利，所有國家法律都必須承認這一點。”

●一個沒有政治家的時代

年初發生的“《查理周刊》事件”曾經給奧朗德和整個法國一次反思和調整的機遇，被稱爲“第五共和國曆史上最不受歡迎總統”的奧朗德因爲在應對中的表現而廣受好評，民意支持率也顯著上升。

當國家、國民安全面臨著嚴重威脅的時候，一個國家的領導人一次又一次的哀悼、一次又一次的遊行，一次又一次的展現信心，卻缺少有效的反擊措施，這不得不說是法國乃至歐洲的失敗。

曆史需要人有所作爲，然而歐洲現在恰恰正處于這樣一個平庸的年代中，媒體人陳季冰曾說：“當歐洲最需要政治家們拿出振奮人心的行動綱領、推動適應時代的重大變革之時，他們卻在抱怨自己生活在‘反政治’時代、做任何‘對的事情’都只會得罪選民……仿佛這樣就能逃避自己身上的責任。放眼當下的歐洲，別說是撒切爾、科爾或密特朗那樣胸懷大志的政治家，就連薩科齊和貝盧斯科尼這樣稍稍擁有一些個人魅力的政治家都幾乎難以尋覓。”

這次巴黎的街頭的慘劇，能讓歐洲人的勇氣和血性回歸嗎?